

流动的叙事学及其媒介自觉——傅修延学术思想述评

Flowing Narratologies and Their Media: A Review of Fu Xiuyan's Academic Thoughts

张 锦 (Zhang Jin)

内容摘要: 本文尝试从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语境着手,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作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技术话语和思想范式出发,从媒介变迁作为叙事形态、模式、权力关系转化的路径切入,总体述评傅修延的学术旅程。在以建立中国叙事学为核心的系统论工程中,傅修延经由对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讨论,经由把叙事学从西方狭义的结构主义流派中解放出来,经由视听嗅味觉等的感官转化,经由对后殖民主义范式的超越,把叙事学变成了跨媒介、多学科的对叙事模式的总体性讨论,变成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多感官的系统阅读和现代阐发,继而在“何以为人”的意义上建立了叙事学面对当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叙事学; 媒介; 系统论; 控制论; 信息论

作者简介: 张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论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学科视阈中的福柯理论研究”【项目批号: 23AWW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lowing Narratologies and Their Media: A Review of Fu Xiuyan's Academic Thoughts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nlightenment” in China in the 1980s, from cybernetics, systems theory, and information theory as the technological discourses and ideological paradigms of the 1980s, and from media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forms, modes, and power relationships, to provide an overall review of Fu Xiuyan's academic journey.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Chinese narratology based on the systems theory, Fu Xiuyan has built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narrative patterns across media and multiple disciplines through liberating narratology from the narrow structuralist school of the West, through discussions on methodology, through sensory transformations of narrative modes among visual, auditory, olfactory, and gustatory senses, and through going beyond the postcolonial paradigm. He has also dedicated to a systematic reading and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s through multiple senses. And then we can say he has established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ethical values of narrat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ow to be a human being today.”

Keywords: Chinese narratology; media; systems theory; cybernetics; information theory

Author: **Zhang Jin** is Researcher in the Center of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specializing in modern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Email: jiangxizhangjin@163.com).

引言：人文学者的直觉、自觉与历史感

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后记中说：“那时我还未料到西方叙事学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只是凭直觉感到不应在叙事学与结构主义之间画等号，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自己的叙事传统”（324）。一方面，经典叙事学只有在超越了结构主义这个特定的思潮和流派后才能从狭义走向广义，成为傅修延建立其自身学术系统——中国叙事学的关键依托，另一方面，这里的“直觉”显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而是一种捕捉生命与生存困境的无意识，它由生活的现实感、流动感和在场感以及个人的生命历程所造就的历史感综合而成，它是一种对生存议题的敏锐把握。傅修延的这种能力正如傅真所说：“但更令我惊奇的是他身上永恒的天真。我见过不计其数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他们坚信自己已经把握了人生和真理，说起话来自负又世故（……）然后我看看我爸，看着他透出好奇和敏感的眼睛，那里面是另一番天地”（486）。在今天这样一个理性、科技以及现代性都不断遭遇危机的世界中，“直觉”似乎超越了个人生命的范畴，成为我们重返文学史、重返思想史寻找新的历史与理论想象力的出发点。所以本文也期待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回溯性地建立一种关于傅修延学术思想的叙述，并以此为支点，打开学术朝向未来的能动性和流动性。恰巧傅修延本人有一种非常清晰自觉的视角转化意识，正如他在《生态江西》“后记”中描述自己的开船经验一样：“现在的人大多数是‘陆行动物’，他们对事物的印象主要来自陆地上的观察，当时的我却和古人一样是在船上看岸上的风景，因此我后来读古典诗文时，会有与别人不同的亲切感受”（144）。这种视角转化正是重新打开文学史的动力机制，重新开始对讲故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探索。

傅修延的阅读与研究范围非常广，中外文学史、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新闻时事乃至科学技术，传统媒介以及新媒介，所以要确切地总结或综述他的学术领域是困难的，更何况他还有参与鄱阳湖经济区生态规划的实践经验，为了写作，笔者本来计划暂且将其学术思想划分为三个

主要的方向：一是叙事学的多年深耕，即他从叙事学内/外与中/外所做的突围实践；二是济慈研究；三是基于地方意识的生态批评、书写和实践。但是学者肖明华已经依据这个划分书写过傅修延：

一说起叙事学研究，学界当无人会否认傅修延乃顶尖学者的几人之一。而说起济慈研究时，一定也绕不开傅修延的开拓性研究。至于在江西当地，若要论及学人的赣文化等地方性知识生产及其对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大概也不能否认傅修延的位置。（……）综观他在叙事学、济慈研究和赣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始终有中国学术文化本位的自觉认同。（……）傅修延的学术研究始终都有“中国性”。（466-467）

这就使得笔者再这样书写变得非常重复和乏味，但是笔者与肖明华划分方法的这种一致性也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真正阅读过傅修延或者受其启发过的学人的基本共识。故而，本文尝试从对傅修延相关论著的细读以及对这些论著与其写作的时代语境之间对话关系的辨析出发，寻找进入傅修延思想的其他方式。

一、方法论与“新启蒙”的语境

回到傅修延写作的年代和语境，是重新体认傅修延学术思想的重要起点。傅修延与同代学人一样是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人文学科“方法论”大讨论和“新启蒙”的语境中开始学术生涯的。关于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和语境，正如贺桂梅所说：“对五四启蒙传统的重新启用，可以说构成了80年代一个持续的文化实践过程。（……）70-80年代的转折期便成为重新高扬五四‘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时期’”（40-41）。对于这样的新时期与新启蒙，贺桂梅敏锐地观察到它与旧启蒙的不同是用“传统与现代”的范畴替代了“反帝反封建”的范畴。但“科学与民主”始终是二者之间的连续性所在。对此，汤一介在“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中也有所论述，他首先高度肯定了“启蒙运动”对欧洲的意义：“这场运动不仅使西方的自然科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而且为西方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5）。所以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方面，启蒙从来不是单向度发展的，它全面介入知识和人的实践，进而汤一介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在80年代（……）为唤起人们对争取科学、民主、自由的记忆而提出的‘新启蒙’，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上的支持。1988年出版了《新启蒙》的创刊号，在此创刊号中发表了元化同志的《为五四精神一辩》。他提出，我们必须接续‘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7）。汤一介还在文中指出了中国新启蒙的方向：“在20世纪90年代，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

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是必然的。那么，中国如何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又可以避免陷入当前西方社会的困境（……）”（9）。这个新方向其实与贺桂梅的讨论一致，即如何重新放置“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借由“国学热”让我们的传统成为现代，同时又期待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在上文关于“新启蒙”的讨论中，科学提供了一种体认社会和政治的方式。而今天又是一个科学力量被凸显的年代，是一个在技术意义上通用人工智能和 ChatGPT 大语言模型的国际力量争夺变得非常可见的年代。在以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表征的科技争夺战中，科学再次成为了理解当下的关键词。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回溯“新启蒙”已降傅修延对中国叙事学的思考与建构，我们也许会从科技与人文互动、思想与时代共振的流动性中体认学术背后鲜活的学者个人印迹与时代话语变迁。傅修延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做过很多关于方法论讨论的探索。这些探索既关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也关系着傅修延日后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实证性基础与路径。

在 1985 年的“思考与困惑：小议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体系”中，对于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如何能引入包容性的新方法，傅修延指出：

我称之为“综合方法”，它指的是系统分析方法、控制论方法、比较文学方法、数学方法以及文艺心理学方法等。这是一些大型化了的、具有较复杂的理论系统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实际上也就在运用它们带来的理论。这些方法之所以出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主要是因为这个领域中存在着一些相应的复杂课题（例如，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文学作品或人物形象中的系统、文学形式演变中的控制机制以及读者心理在欣赏中所起的作用等）。（56-57）

这段话提示我们傅修延在上世纪 80 年代对自然科学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自觉使用，在具体讨论中国古代小说例如《红楼梦》《西游记》等中的人物和叙述动力控制问题时，这些方法始终是他进行格义和视角转化的重要基础。应用这些复杂的方法，正是傅修延把自己阅读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外国文学史转化为系统的批评、信息化的批评和局部与整体的控制关系批评的框架机制。傅修延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中的新进展和科学方法，例如数学方法，从来就抱有极大的热情”（“思考与困惑” 57）。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就是在西方的科学进展及其对人文阐释框架的重新转化语境中进行的。而在科学的问题中，也包含着民主的向度，傅修延不断强调使用新方法时不忘民族方法的独特性，及其对现代科技方法论的补充：“我完全承认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的长处恰恰是新方法的短处。那种凭直觉、灵感和颖悟能力进行的批评，把一切论证过程，亦即方法

的运用过程都隐没到了水下，露出水面的只有结论——那种用东方人颇为自豪的沉思与顿悟的本领得出的结论”（“思考与困惑” 58）。这种吸收前沿科学技术与传统的直觉顿悟，把古今中外方法融为一体的方法论自觉说明傅修延始终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立场。

在上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也伴随着方法论大讨论成为重要议题，如何重写文学史涉及方法论、经典化以及当代化的问题，傅修延主张文学史写作要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新架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对范畴明显具有索绪尔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色彩，可以说当时傅修延在尝试用最新引入我国的人文科学方法来反思文学史的书写，他认为“肯定文学史的共时属性，无非是想说明，往昔的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和今天的读者的审美感受力，能够超越巨大的时空间隔，使得本应按时间进程排列的文学现象均匀播散在人们的心理平面上”（“文学史新架构刍议” 10）。傅修延的这个共时性论述非常契合法国结构主义时期关于信息论和语言学转向的论述，即当所有的文献，无论是历史的、文学的还是其他的，都是“符号”意义上的信息时，这种对文献的拉平和信息化，使得文学史的讨论变成了信息如何能够共时地呈现在当下的问题意识中，同时傅修延的描述又能让我们看到阐释学所描述的历史与当代的关系。这样就能有效克服历时性的时间线索与共时性的当下平面之间的关系难题，即文学史为什么不是记流水账，而是有意义的当下建构，正如福柯（Foucault）所说：“这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中流传着的所有书籍的一般科学：符号学（……）人们在时代的全部产品中考察文学，将文学置于其共时性的厚度中”（156）。

在论及文学史的历史背景时，傅修延说：“政治、宗教、哲学、科学和其它艺术门类也在影响着文学。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文化心理环境，文学既是其产物，又是其中一个子系统，文学作品的作者既受其影响，又反过来对其施加影响。这个文化心理环境，我们认为就是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中介”（“文学史新架构刍议” 13）。在经济基础与文学上层建筑关系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式的讨论背后，这里我们还能更清楚地看到系统论，即整体与局部，系统与系统之间，大系统与子系统等控制论、系统论理论对傅修延思考的影响。傅修延也确曾引用过美国控制论专家维纳讨论小说中的人物设置：“此处的小标题模仿了控制论专家维纳的书名（《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不过此处的‘人’指‘人物’。以上的论述已经进入了这个问题的边缘：从叙述角度对人物的种种考察实际上透露了人物在叙述中各有各的用处”（“人物与叙述” 22）。可见，在方法论层面，傅修延通过叙事作品的人物塑造触及了最为前沿的理论议题。

而在“思维科学与文学批评”中，傅修延和黄颇指出：“文学批评方法学的研究，有必要把重点从方法本身转移到批评主体身上来，文学批评思维学就是以这个重点转移为其理论支点的，在主体、中介和客体三者当中，文

学批评思维学把重点放在主体方面，而不是客体或中介方面（……）如今整个科学界，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觉察到了研究人类自身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就使得思维科学具有辉煌的发展前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156-157）。傅修延在这里提出了关于主体、人类的客体化、作为生物学对象的人类自身、作为思维学和技术的人类自身的关键思考，即“何以为人”应体现为“研究人类自身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主体论或人学论，而是对人类的研究，这种对人类的研究本身就是与科学、生物学、解剖学乃至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直接相关的，傅修延正是在这个科学语境中回应方法论问题和时代议题，这个议题在今天同样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新技术和通用人工智能等问题时。与维纳相似的是，他们二人都关注技术中的“人”，或者说“人有什么用处”，当维纳抱怨说：“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116）时，傅修延和黄颇也提到“人不是思维机器，批评者也不是装上了文学程序的电脑（……）他作为人所接受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作为文学批评者所接受的信息量，因而他的兴趣、意志、情感、道德等非智力因素，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文学批评思维活动”（“文学批评思维的情感因素”107）。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思想范畴始终是傅修延体认时代和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关键所在。

“文学批评的还原思维与系统思维”更为直接地区分了还原论与系统论：“还原思维和系统思维分别以还原论和系统论为其理论基础。从本质上区别，还原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处理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时，系统思维也要从组织性，即不可还原性出发，先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然后从整体上把握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傅修延 黄颇 63）。这样一种处理作品的方式，预示着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式的还原思维将被系统论式的环境、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历史、时代、信息、政治、经济综合式处理文学文本的方式所替代。同时，傅修延和黄颇也看到系统思维方法可能带来的问题与误解：“系统思维，可能会有人嗤之以鼻。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不可能或目前还不可能数学化和定量化，所以人们认为系统论不可能横移到文学批评中来。殊不知系统论分三个层次，即系统理论、系统方法和系统技术，文学批评的系统思维虽然还不能运用系统技术，却可以并且已经有人运用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文学批评的还原思维与系统思维”64）。所以，他清晰地辨析出我们使用系统论的有限性和有效性：

第一，文学批评的系统思维强调批评对象的不可还原性（……）第

二,文学批评的系统思维一定要坚持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第三,从思维方向上看,文学批评的系统思维者,目光闪烁不定,思路毫无拘束。文学批评系统思维必须同时处理来自不同思路的大量信息,批评者在目前无能利用数学工具的情况下,利用语言工具也能够处理大量的信息。 (“文学批评的还原思维与系统思维” 65)

不可还原、朝向批评目的的整体性是系统批评的关键,而信息论与数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关系也在文学系统论的方法层面被傅修延带出,这与他今天讨论听觉转向、智人与讲故事的人、趣味叙事学、嗅觉叙事学等问题也都密切相关。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傅修延和黄颇就敏感地指出:“系统思维是一种前途不可限量的思维方式(……)应该说,现在还不是总结文学批评系统思维的时候,因为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系统思维的精彩表演还在后头”(“文学批评的还原思维与系统思维” 67)。这种直觉,这种从内部对技术的重视说明傅修延总能有效地在人文学科内部回应时代的技术议题。

在“试论文学叙述中人物的生成”中,傅修延说道:“人物何以在叙述中生成这个问题象苹果何以会落地一样简单而富于深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解释一个更大更有趣的问题。文学叙述为什么会具有‘可读解性’——生活在真实世界的人们怎么能够轻而易举地明白虚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19)。所以对人物生成过程的重新提问本身就是对在新的语境下意义如何重新生成的讨论。此时,人脑也被以一种计算机和信息论的方式打开:“人脑真是奇妙无比的电子计算机,它可以跨越序列、事件的鸿沟,将各处获得的印象分类整理,也可以穿透事件表面提取其暗含的人格特征”(19)。傅修延用人脑与电脑的关系讨论人物生成问题显然是与当时技术的新方式共振的,电脑是他所关注和思考的黑箱。

大概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对方法论的讨论,对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自觉接受、反思和征用之后,傅修延发现必须重新回到文学实践,如果只是文艺学地讨论方法,难免流于空泛。故此,他一头扎进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业,即以丰富的中外文学史和历史知识为依托建构中国叙事学的体系论说。

二、从狭义的西方叙事学到广义的中国叙事学

在科技与“新启蒙”的语境中重审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主流批评范式的新批评,即广义的形式主义,就会发现,它虽然有去政治化的层面,但是这种形式论也有一个清晰的科学语境,即把文学研究科学化,但科学不是泛泛而言,而是具体到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这些战后的科技理论被人文科学征用和反思的细节上。傅修延后来用“物理学钦羡”反思叙事学理论的科学维度,反过来证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当时的新启蒙语境中延续

着科学与民主的脉络，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就不仅仅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个非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过程，而是有着科学与民主的内在动力，这样傅修延作为一个学者在科学语境中的紧迫感就更加能清晰地被我们所把握。

从傅修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叙事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加拿大访学的时候也听过弗莱讲述神话学和叙事学的课程，而在访学前后他对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又做过深入的阅读与研究，进而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工具箱”重新讲述中国的叙事传统。

实际上，来自欧洲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一个狭义的文学批评或小说批评概念，它是对弗洛伊德意义上资产阶级小说和大量有着清晰结构的民间故事的人称、叙事、结构、聚焦等的科学分析，它是在欧洲战后的科技与历史语境中对19世纪文学批评方法的反思、总结和超越。然而翻译到中国，在区分了结构主义与叙事学后，傅修延等学者把叙事学从狭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改造为一种总体的和一般的方法论，进而借用这个一般性方法重新整合我们中国的叙事传统，尝试在中国建立系统的叙事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文学阐释实践。他通过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对《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所做的自由与非自由，正统与非正统的结构分析和大契约、小契约的框架阐释十分精彩，他对小说中人物的动力系统例如唐僧的取经意愿，以及对人物的角色系统的分析也都堪称经典，对距离控制、隐含作者等的论述也都有理有据。这些都具有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意义上的新方法论色彩，傅修延非常清晰、自觉地把握着这些理论如何进入文学理论领域的方式。在“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中，傅修延特别强调了复数的叙事学，可见叙事学早已超越了西方的地方性和狭义的时间和历史性而走向了可以进行多元建构的对象和方法领域：“‘叙事学’由单数(narratology)变为复数(narratologies)，指的是这门学科从单一的语言学模式中挣脱出来，在借鉴‘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中获得生机，从而开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7)。将叙事学变为复数，就是尝试从学科、媒介、对象和方法内外让叙事学突围，从内部让叙事学从单一的语言学模式中解放出来，纳入各种方法，而从外部，傅修延则提出“叙事学与结构主义脱钩，意味着森严的门户壁垒就此被打破(……)而‘叙事学’与‘叙事研究’可以互换之说，则使叙事学由普通人仰之弥高的象牙塔变为不设门禁的市民广场——只要符合‘叙事研究’这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不管是理论研究、作品批评还是别的什么，统统都在‘准入’之列”(8)。这种脱钩和解放也以“后经典叙事学”中的“认知论转向”与“跨学科趋势”为标志把叙事学向整个人文学科重新打开。在傅修延看来：

将“叙事学”等同于“叙事研究”就像是去除了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海纳百川必然导致洪流滚滚与众声喧哗，以往人们只知道小说叙事之外还有影视叙事、戏剧叙事、历史叙事和新闻叙事，现在法律叙事、教育叙

事、医学叙事和社会学叙事等也来到了这个狂欢广场。还要看到的是，当下的叙事传播正面临从纸质媒体到电子媒体的急剧转换（……）有了叙事学这样的学科立交桥，不同领域的研究能够从交流中获得新的活力与生机。（“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11）

不仅是从文学叙事泛化到各领域，而且从纸媒到电子媒介，傅修延看到了叙事学发展的大量前瞻性领域。在这个前瞻性中，傅修延很客观地放置了中国主体：“中国叙事学的‘现在进行时’，主要表现为从叙事角度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那么，为什么对叙事传统的研究会成为这方面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它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外来影响的遮蔽。必须看到，中国小说的现代换型与近代以来西方小说的大量输入有直接关系”（“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16），所以傅修延走向的是文化自信和创伤的治愈：“汉语地位的上升和中国叙事学的提出一样，反映了时代环境与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没有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大潮，没有历史创伤的痊愈和文化自信的恢复，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叙事学的登堂入室”（“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22）。

80年代在西学的压力下，我们不仅会寻找自己的问题，而且迫切地要建立自己的叙述系统论，以使得自己的问题得以被看到和表述，面对这一紧迫的问题，在“试论中国早期叙述的欠发育问题”中，傅修延首先把叙述从欧洲叙事学的狭义思潮中抽取出来，对它做了一个普遍性的定义，即“文学叙述（下称叙述）就是讲故事，不管是用口还是用笔”（63），进而尝试将中国放入一个新的系统中讨论：“从这个概念出发，从《山海经》经唐代传奇到明清小说就成了一个整体——中国叙述。中国叙述始于神话，到唐代才蓬勃发育”（63）。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傅修延认为非常必要，“因为中国叙述的许多本质特征就溯源于此”（63），这个问题主要体现为人物的行动意愿，即“愿望是故事的动力源泉，一个微不足道的愿望可能藉着因果律的力量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驱动主要事件的强烈愿望”（65）。从中可见，傅修延在当时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改变现实，参与行动的强烈愿望。

在“人物与叙述：中国叙述学的一个课题”中，经过与西方的叙事传统的比较以及设立人物的衡量尺度，傅修延提出：“广大读者光凭直觉也已感到我们的人物画廊不比别人逊色，我们的目的是运用这些尺度量出那些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19）。对于新的方法傅修延用化学元素周期表做了类比：“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发明以后，人们据此找到了一些新的元素，因为元素周期表先从理论上确定了它们的存在。同理，运用上述尺度能够反躬自省出我们没有写出甚至是别人也未曾写出的新型人物”（20）。另外，对于故事动力的问题，先行的研究也比较少，傅修延用信息论的方式解释道：“故事动力有个传递问题，叙述本身也有个信息获得（观察）与信息传送

（叙述）的问题”（21）。把信息论放入作品的阐释，正是当时技术与文学研究相交织的体现，乐黛云先生在1980年代也曾写过“跨学科研究——以熵与文学为例”系统谈论物理熵和信息熵对于文学作品研究的意义，并从信息熵的高低分析了文学作品的信息传递问题，可见当时人们所共享的信息论语境。

在“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中，傅修延提出：

中国叙述学是与中国诗学并列平行的一个学科范畴（……）叙述即讲故事，作为一种传播带有虚构成分事件的行为，它存在于从上古神话到现代小说乃至当代影视故事片这一系列文学“通讯”之中。（……）和其他民族一样，我们的叙述也呈现出由口头到笔头再向“镜头”发展的轨迹，这也就是说，人类科技进步使叙述的媒介越来越丰富。但不管媒介如何转换，叙述作为讲故事这个实质一直未变。据此，可以看出小说等媒介只是叙述发展史中的一章，叙述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载体。（69）

傅修延在这里把叙事学从狭义的小说叙事的范畴解放出来，尝试建立叙事学与人类历史共在的多媒介方法意义。进而，用中国叙事文学精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开刀，傅修延把四大名著以及其他的中国叙事文本从不同感知媒介和方法反复打开，阐释的效果历史和期待视野，即叙事学研究的当下性也被一并带入读者的视野。

三、叙事的媒介自觉

傅修延在讨论叙事学时，除了有突破狭义叙事学的学科、方法、对象和西方传统的自觉外，还有对叙事的技术与媒介维度的敏锐自觉。在“关于21世纪文学叙述的展望”中，他预言：“今后的故事消费者将有主动控制叙述的自由——在提供了无数选择机会的电脑文本上进行‘二度创作’，这种富于创造色彩的参预将极大地刺激故事的消费，推动叙事文学走向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新繁荣”（72）。随着计算机成为文学新的物质性载体，故事的创作和消费方式都会因为媒介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消费格局的变化只会影响旧的消费方式，故事讲述人的地位却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未来的电子故事，它们都需要有直接创作或由小说等其他作品改编而来的剧本，这一剧之‘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75），这就将故事本身、将故事的创造主体本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傅修延不仅指出了故事对于任何媒介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作家要做好的适应新媒介的准备：（1）“镜头意识”；（2）应该增强自己故事中的“可能性”；（3）“应该强化自己的经济意识”（75-76）。因为“当代科技，尤其是电脑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文学界的反应给人的印象是猝不及防穷于应付（……）”（77）对急剧变化的现实进行总体关注，正

是傅修延毕生的学术实践追求。

由于对媒介的自觉，傅修延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听觉、味觉、嗅觉等各种媒介层面。文学作品还是那些文学作品，《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但是它们就像“不可靠叙述”一样，被反复从不同媒介的维度重新打开，顿时读者才明白原来我们无法真正看到一部作品的全貌，而这种视而不见，但听而可见或闻而可见的现象，也恰恰说明了作品的丰富性和人的有限性。在“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中，傅修延尝试从听觉角度重新叙述中国的叙事传统。在一种新的听觉范式中，傅修延指出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创伤心理：“将亚理士多德的结构观奉为正宗，对上世纪初年的中国学者来说还有时代风气的影响。胡适等人对明清小说的批评并非个例，许多未亲身在西方文化中浸润过的同时代人也觉得自己的小说不如人家，这种‘自我矮化’心理的产生，与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信心连续遭受重创不无关系”（141）。进而傅修延说到小说标准的问题：

为什么胡适等人会将中国小说的结构形式视为正常之外的异常，他们衡量小说结构时使用的正反尺度，如“主干”与“碎锦”、“布局”与“散漫”、“系统”与“支蔓”等，明显采用了以线性秩序为正常、以非线性秩序为异常的西方标准。胡适对《红楼梦》中“翻来覆去”的做生日、起诗社表示“讨厌”，这“讨厌”二字透露出他的西式文学胃口已经无法容纳“缀段性”这样的中式结构。（141）

我们这种自晚清以来的矮化心理所对应的正是在全球史语境中，鸦片战争对国人自信的重创，而在这篇文章中傅修延反复用西装革履和长袍马褂来形容中西的不同，说明他已经超越了这种无意识创伤，尝试把近代欧洲小说及其叙事学标准历史化和地方化，为中国模式预留空间。所以他认为“审美品味的不同缘于文化的不同，文化没有美丑之分，讲故事的方式也无对错之别”（141-142），并将叙事的多元性和民主性放置在我们面前：“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本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西文化包括感官文化在许多方面可以相辅相成，没有必要完全倒向一方”（143）。

在“听觉叙事研究的缘起、话语创新与范式转换”中，傅修延从听觉范式强调了中国叙事学获得历史性位置的方式和策略：“夜幕降临后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洞穴中人不但需要点燃篝火以驱散心中的恐惧，还需要有一个众人都能听到的声音来维系共同的精神关注——这个声音讲述的故事可以五花八门，但不管讲述的是什么，都会让篝火边的人觉得自己和身边人拥有同样的价值观”（89）。当傅修延说“中国小说与口头叙事有更深的渊源”（“听觉叙事研究的缘起、话语创新与范式转换” 90）时，其实是在为新的时代语

境中“重听经典”的话语权力、媒介权力、技术权力寻找中国古典的依据，尝试在这一波媒介变革的大潮中确立中国传统和中国主体的出场机会。

四、超越后殖民主义范式的主体观

在“问题、目标和突破口：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谏论”中，傅修延直接批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然而某些自视甚高者在这种场合却忘了要注意‘政治正确’，西方之外的一切在其眼中属于‘地方性知识’，不能与西方叙事传统这种‘一般性知识’等量齐观。（……）如今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在归纳一般的叙事规律时，一些人依旧在自说自话，没有人会为自己的理论大厦缺少东方支柱感到遗憾和惭愧”（20）。西方把自己作为普遍性，而把别人作为地方性，普遍性生产知识的规则，地方性服从规则，傅修延的这个总结清晰地揭示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殖民逻辑，而对此的揭示和呈现，也反映出傅修延超越后殖民范式，尝试去除东方的地方性位置、生产“普遍性”知识的努力。所以，傅修延有意把经典叙事学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知识提示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突破西方普遍性的规则与范式，重新图绘中国和世界的叙事传统：“上世纪60年代创立于法国的经典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传统，西方学者赖以立论的依据相对比较单薄，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应该回过头来梳理自身所属的本土叙事传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展示中西叙事传统各自的形成轨迹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与激荡”（20）。超越把地方性建立为普遍性的西方话语逻辑之后，傅修延探寻的也正是中国如何以主体身份加入“世界”想象：“仅凭西方话语逻辑能否建构出具有普适性的叙事理论？全球化进程下的叙事学研究难道还能继续无视中国的叙事传统？对中西叙事传统作比较研究是否有利于叙事学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的学科？为了让叙事学成长为歌德和马克思憧憬的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我们应该当仁不让地挑起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这副重担”（20）。这段话直接表达了中国叙事学的世界文学面向和承担。傅修延认为西方叙事传统主要是指18世纪以后的小说传统，但是中国叙事传统却突破了叙事学与小说之间的绑定关系，“中国的叙事传统如崇山峻岭般逶迤绵延了数千年，每个时代的每种文体都对故事讲述艺术做出了贡献，且不说史传、传奇、杂剧和章回小说等人所共知的叙事高峰，过去只从抒情角度看待的诗词歌赋（包括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宋词等在内）中亦有无数的叙事佳作，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座储藏量极为丰富的宝库”（21）。进而他对刘知几、张竹坡、毛氏父子、金圣叹的叙事和评点观一一举凡讨论，然后把中国的叙事传统接续在梁启超所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22）这样的家国维度。对他来说，无论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还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顾颉刚的中国民间传说研究，都把对中国叙事经验的重新叙述放置在疗救民生的高度。

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中，傅修延则指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全球化为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视野宏阔、胸怀天下的国民，不可能为其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一国之民拥有什么样的视野与胸怀，是否对外部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又与国民经常倾听什么样的故事不无关系。我们既要汲取叙事传统中蕴藏的智慧，又要探索能适应当前和未来形势的故事讲述方式，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继续前行。（60）

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在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时，人们反而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傅修延向我们指出，只有有理想、有胸怀、有视野、有理念的个人和民族才能真正讲出故事来。傅修延之所以能从各种媒介、角度反复讲述中国故事，正在于他捕捉生命当下性的强烈意愿。中国的甲骨、青铜、《易经》《诗经》《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汉赋、唐传奇、民间传说、明清小说皆可在视听味嗅不同层面展开叙事研究。在“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中，傅修延通过对荀况的《成相》到兴盛于汉代的文人赋再到唐宋以后的散文体叙事的探查，讨论了民间的韵诵传统对我国叙事文学的影响，说明了抒情和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傅修延总结道：首先，“叙事的演进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应当用更复杂、更具穿透性的眼光来探寻各种文体的相互影响”（8）；其次，“叙事的演进是雅俗互动的结果，大众文艺传播往往比作家文学更具活力”（38）；第三，“以前人们总是沿着‘前小说’、早期小说这样的线索去寻找叙事演进的痕迹，实际上在叙事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赋体文学曾经发挥了比其他文体更为重要的作用（……）”（38）。因此叙事传统不仅发生在高雅的文人书写中，还存在于活泼泼的民间生活中。

在“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中傅修延专门对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进行叙事学分析，论文围绕着女性身份和状态的变化、跨越和故事讲述的互文见义展开：“人物的变化实际上是身份或状态的变化，发生这种变化为的是跨越形形色色的鸿沟：蛇精变形跨越了人妖之隔，祝英台易服跨越了男女之隔，孟姜女投海跨越了生死之隔，织女下嫁跨越了仙凡之隔——她与牛郎变星还跨越了动静（瞬间与永恒）之隔”（207）。通过反复与多角度讲述的故事，四大民间传说“由于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了一个化蝶的结尾，梁祝传说把真爱不朽的思想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美好的事物不会真正死去，自由值得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死亡在爱情面前显得是那样无能为力”（208）。虽然在这个层面上，梁祝的故事似乎超越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性而获得了一种永恒的对爱的成全，但傅修延对爱与美好事物的理解，又不由得让

我们想起他对济慈“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解释，傅修延就是这么一个跨文化的存在者，这么一个将自我和他者有效地结合到自己人格结构中的学者：

“爱情是诗中这‘美的事物’之一，但他着力歌颂的爱不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对整个人类的爱”（“济慈美学思想初探” 70）。

结语：叙事学的本体论——人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等新媒介技术强势进入人文学科，“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人文学思考的焦点。在这样的技术语境中，在对作为“智人”的人类简史的重新讨论中，傅修延在“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中再次通过对叙事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和定义尝试在人机之争中，谈论人的主体性、意义和伦理位置问题。通过对“叙”和“事”二字连用的出处的考证，他指出“讲好中国故事”深层含义是“把中国的事情‘做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叙事’即‘行事’的本义。这一表述的激励作用，在于让人意识到我们正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在用实际行动上演一幕幕时代大剧。正是这种把自己看成故事主人公的感觉，让‘叙事’与‘行事’这两条平行线发生交会”（87）。由于“叙事的主体是有伦理立场的人，这一点决定叙事必然体现或促成某种价值观。（……）不管是部落、族群还是邦国，所有‘想象的共同体’之建构与维系，都有故事讲述的一份功劳。人类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关键在于能够通过叙事推动相互间的精诚合作”（88），这种讨论超越了叙事学的范围，将叙事研究上升到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探究。

Works Cited

Foucault, Michel. *Folie, langage, littérature*. Paris: Vrin, 2019.

傅修延：“文学史新架构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87）：10-17。

[Fu Xiuya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New Structure of Literary History.”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1987): 10-17.]

——：“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3）：86-101。

[—.“Are Humans the ‘Homo Narrators’? A Study of What Narrative Is, What Narrative Does and Where Narratology Goe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 (2023): 86-101.]

——：“人物与叙述：中国叙述学的一个课题”，《江西社会科学》8（1993）：18-35。

[—.“Characters and Narration: A Topic in Chinese Narratology.”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8 (1993): 18-35.]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Chinese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 “互文的魅力: 四大民间传说新释”, 《江西社会科学》4 (2014): 205-214。
- [—, “The Charm of Intertextualit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Great Folktale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4 (2014): 205-214.]
- : “中国叙事学开篇: 四部古典小说新论”, 《文艺争鸣》1 (1995): 69-80。
- [—, “Chinese Narratology: An Inaugural Study on the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1 (1995): 69-80.]
- : 《生态江西》。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022 年。
- [—, *Ecological Jiangxi*. Nanchang: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22.]
- : “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中国比较文学》4 (2014): 1-24。
- [—, “From Western Narratology to Chinese Narratolo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4 (2014): 1-24.]
- : “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 《江西社会科学》9 (2007): 26-38。
- [—, “Fu and 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 in China.”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9 (2007): 26-38.]
- : “试论文学叙述中人物的生成”, 《文艺理论研究》3 (1991): 19-23。
- [—, “On the Generation of Characters in Literary Narr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 (1991): 19-23.]
- : “试论中国早期叙述的欠发育问题”, 《南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 (1993): 63-68。
- [—, “O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Early-Stage Narr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1993): 63-68.]
- :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文学评论》2 (2018): 60-68。
- [—, “One Era Has Its Own Narrative: O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Literary Review* 2 (2018): 60-68.]
- : “听觉叙事研究的缘起、话语创新与范式转换”, 《中国文学批评》4 (2021): 89-97+157。
- [—, “The Origin, Discourse Innov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of the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4 (2021): 89-97+157.]
- : “济慈美学思想初探”, 《江西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 (1982): 68-73。
- [—,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Keats' Aesthetic Thoughts.”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1982): 68-73.]
- : “问题、目标和突破口: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谏论”, 《外国文学研究》3 (2018): 19-29。
- [—, “Problems, Aims and Breakthroughs: 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8): 19-29.]
- : “关于 21 世纪文学叙述的展望”, 《求是学刊》3 (1995): 72-77。

- [—, “Prospects for Literary Nar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eeking Truth* 3 (1995): 72-77.]
- : “思考与困惑: 小议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体系”, 《文艺理论研究》4 (1985): 55-58.
- [—, “Thinking and Confusio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olog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 (1985): 55-58.]
- :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文学评论》1 (2016): 135-144.
- [—, “Why McLuhan Called the Chinese ‘Auditory People’: The Auditory Trad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Narrative Construction.” *Literary Review* 1 (2016): 135-144.]
- 傅修延、黄颇: “思维科学与文学批评”, 《文学评论》6 (1988): 156-157.
- [Fu Xiuyan and Huang Po. “Cognitive Scienc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Review* 6 (1988): 156-157.]
- : “文学批评思维的情感因素”, 《江西社会科学》5 (1988): 107-112.
- [—, “Emotional Dimensions in Literary Critical Thinking.”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 (1988): 107-112.]
- : “文学批评的还原思维与系统思维”, 《天津师大学报》6 (1988): 63-67.
- [—, “Reductive and Systemic Thinking in Literary Criticism.”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6 (1988): 63-67.]
- 傅真: “诗意地栖居——我眼中的父亲”, 《俊彩星驰——当代赣籍文艺家访谈与述评(下)》, 《创作评谭》编辑部编。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4年, 第481-487页。
- [Fu Zhen. “Poetic Dwelling: My Father in My Eyes.” *Brilliant Stars: Interviews and Reviews of Contemporary Jiangxi-born Artists (II)*,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Creation Review*.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24. 481-487.]
- 贺桂梅: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
- [He Guimei. “New-Enlightenment” *Knowledge Archive: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1980s*.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汤一介: “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2012): 5-11。
- [Tang Yijie. “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Enlighten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12): 5-11.]
- 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 陈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
- [Wiener, Norbert.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Chen B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8.]
- 肖明华: “清晰的学者身份与中国化转型的引领者——傅修延教授学术研究述评”, 《俊彩星驰——当代赣籍文艺家访谈与述评(下)》, 《创作评谭》编辑部编。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4年, 第466-480页。
- [Xiao Minghua. “Clear Academic Identity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Professor Fu Xiuyan’s Academic Research.” *Brilliant Stars: Interviews and Reviews of Contemporary Jiangxi-born Artists (II)*,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Creation Review*.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24. 466-480.]